

動盪不安的薩爾瓦多政局

王建勛

中美洲動亂已將近七年，除了尼加拉瓜桑定政權不時引發地區情勢緊張之外，薩爾瓦多的內戰仍在持續發展，亦是中美洲地區情勢緊張的一個焦點。自一九八四年薩國舉行總統選舉，恢復民主政治以來，雖有美國大規模的軍事援助，但政府軍陷於苦戰，迄今政府軍與左派游擊隊仍難分勝負，形成僵持局面。執政的基督教民主黨與極右派聯盟，雖然面對同樣的敵人，但兩者仍繼續對抗，使任何改革計劃均難順利進行。加以一九八六年十月十日的大地震，更加深了薩國的經濟危機，杜哈特總統近年推行的「經濟穩定計劃」，亦引起左右兩派掀起一股反政府浪潮。左派游擊隊企圖以長期的消耗戰，陷薩國政府於癱瘓；而右派則意圖鼓動軍方發動政變。從而顯示杜哈特總統領導的民主政治，仍然非常脆弱。茲就薩國的政治鬥爭、流血衝突以及經濟危機等情況分別探討，以觀察薩國政局之發展。

壹、政治鬥爭

薩爾瓦多是中美洲土地面積最小而人口密度最高的國家。在二萬一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有五百三十多萬人，平均每二平方公里有二百五十二人。又因為薩國土地百分之九十是火山地帶，可耕地不多，隨著人口快速的增加，土地分配問題日趨嚴重。

薩國早期曾因土地問題而經常發生暴動。一九二九年薩國陷入經濟危機，一九三〇年無地耕種的農民暴亂，而大地主則要求軍方維持秩序，結果引起一九三二年馬丁尼（Hernandez Martinez）領導軍事政變，在軍事鎮壓下，有三萬人喪生，幾佔當時人口的百分之三。①從此以後，大地主的利益一直由軍人保護，土地問題所引起的政治與社會衝突日益嚴重。

註① Norma Stoltz Chinchilla, *Revolution in Central America*, Stanford Central America Action Network, Westview, 1983, pp. 14-15.

進入一九六〇年代，薩國百分之四的人擁有百分之六十七的可耕地。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六十的農民無地耕種，長年為地主工作，且經常供過於求，失業農民充斥整個鄉村，甚而大量湧向城市，使城市社會問題更加嚴重。迄今薩國無地耕種的農民仍在增加之中。此一人口密度極高的國家，不僅國民所得分配不均，那些無地耕種的農民在大地主壓制下，已沒有接受教育的機會，幾乎全國六〇%的農村人口都是文盲。在這種情況下，無地耕種而又生活困苦的印第安人即成為社會暴亂的根源。

從一九三二年起，薩國即因社會動亂不已而進入軍事統治。近廿年雖已逐漸恢復選舉，但歷次選舉大都是在保守派軍人控制下選出軍人出身的總統。一九六九年七月，薩爾瓦多和宏都拉斯發生戰爭以後，軍方要加強軍備、政治動員，而在野黨唯恐軍方加強軍事鎮壓，而開始反抗。一九七〇年大選，中間偏左的「基督教民主黨」(Partido Democracia Christiana-P.D.C.)候選人杜哈特(Nepoleón Duarte)與右派支持的軍方候選人莫里那(Arthur Molina)競選總統，而擴大了左右兩派的衝突。由於選情對莫里那不利，軍方即以發動政變，迫使杜哈特逃往委內瑞拉。至一九七七年大選，左右兩派鬭爭更趨激烈，軍方支持的總統候選人羅米洛(Humberto Romero)雖然獲勝，但已激起在野黨一致的反抗，不斷發動學生、工人與農民示威和暴亂。而極右派和大地主所支持的右派恐怖組織，也不斷向左派暴徒採取報復，致使社會衝突日益升高為游擊戰。

一九七九年十月，薩國爆發由左派軍人所領導的軍事政變，莫里那被推翻，即由左派的軍人與基民黨、左派政黨組成左傾的聯合政府。一九八〇年三月，左傾聯合政府依據第二〇七號土地改革法案，推行土地改革，曾把五百公頃的土地分配給無地耕種的農民；有三萬一千三百五十九戶農家的卅萬農民獲得土地。②然而當時出任國會議長的極右派領袖陶布森(Roberto d'Aubisson)，不僅在國會中極力阻撓土地改革計劃，並利用極右派恐怖組織，不斷暗殺屬於基民黨或左派政黨的地方官員，恐嚇支持土地改革計劃的國會議員，幫助大地主驅逐已分配到土地的農民。甚而原本不屬大地主的土地，亦被大地主奪去。有者把土地紛爭訴諸法院，然而法院經常作出有利於大地主的判決。③土地改革不僅未能解決土地問題，反而造成鄉村情勢的緊張，農民以暴力對抗暴力，而擴大了流血衝突。

一九八二年三月廿日，薩國舉行制憲國會議員選舉，美國原期望薩國能經由選舉程序緩和內部衝突，俾便以和平方法解決薩國危機。可是右派在國會議員選舉中得勢，受軍方和大地主支持的極右派「國民共和聯盟」(Alianza Republicana Nacionalista-ARENA)領袖陶布森，得能聯合其他右派政黨以多數控制國會。而各黨派協議推出的臨時總統馬加納(Alvaro Magana)，則無法控制全局。極右派仍反對改革，繼續以暴力和恐怖手段阻止薩國走向民主，那些沒有進入國會的左派「民主革命聯盟

「(Frente Democrático Revolucionario-FDR) 和左派游擊隊，則意圖以武力獲致最後勝利。」

薩國內戰初起，在美國引起很大爭論，特別是雷根總統要以強硬政策支持薩國政府，而美國國會則唯恐薩國內戰成爲一個「新的越戰」，而不斷限制雷根政府的軍事行動。^④美國國會對薩國軍事援助，經常附帶有改善人權、實行社會與土地改革等條件。雷根總統爲減少國會的阻力，乃促使薩國於一九八四年三月廿五日舉行總統選舉。結果，基民黨領袖杜哈特，在第二回合以獲得五三·六%的選票，擊敗極右派領袖陶布森，而當選總統。

杜哈特自一九六〇年領導中產階級創立基民黨後，即一直爲建立民主和公平的社會而奮鬥。他強調薩國的內戰是來自兩極的對抗，無論是極右派或極左派，其性質都是破壞性的，所以他要嚴厲的制裁極左派或極右派的暴力，保證各項改革繼續進行。因此，杜哈特在最初的一年，除了在強化司法、厲行法治、抑制左右兩派的暴力、使軍隊接受憲法的約束、保持不干預政治的立場等方面已稍見成效之外，土地改革仍然無法順利進行。杜哈特要安撫那些害怕他實行社會主義的資本家和大地主，並取得他們的支持以便從事經濟發展，以避免資金繼續外流，乃不得不暫時向極右派控制的國會低頭。雖然一九八五年三月國會議員及地方選舉，基民黨獲勝^⑤（但仍未獲得國會過半數席位），對其推行各項改革有很大助益，但是左派游擊隊已把杜哈特政府視爲主要敵人，而極右派仍繼續反對杜哈特政府的多項改革，致改革阻力重重。

極右派聯盟，不僅有大企業家以及大、中、小地主的支持，還擁有農民和工人的廣大羣衆，所以它不僅代表大地主和大企業家的利益，並趨向「法西斯主義」，而且亦形成一個代表各階層利益的反共堡壘。就因爲極右派聯盟內部份子複雜，有些不滿意極右派實行恐怖主義的份子，在選舉中即轉向基民黨，而使基民黨在選舉中獲勝。一九八五年三月國會議員選舉以後，極右派聯盟內部分裂，爲了抑制內部的混亂，在同年九月召開的代表大會，排除了陶布森的領導，推選大咖啡商卡斯汀（Alfredo Cris-tiant）爲該聯盟的領袖，以重建該聯盟的羣衆基礎。^⑥事實上，大地主和資本家一向不信任基民黨，改組後的極右派聯盟仍然堅持反對杜哈特政府與左派游擊隊談判，更反對土地改革，即使杜哈特總統希望與極右派妥協，亦難以改變他們的敵對。所以在無法克服極右派的阻力之情況下，那些迫切期待杜哈特總統實踐諾言的選民均感到失望。

註④ *Ibid.*

註⑤ 一九八五年三月的國會議員選舉結果，在國會六十個席位中，基民黨獲廿四席、極右派聯盟獲十九席、右派的薩爾瓦多制度黨（Partido Institucional Salvadoreño）獲九席、右派國民協調黨（Partido Conciliacion Nacional）獲五席、右派民主行動黨（Accion Democratica）獲兩席以及極右派人民黨（Partido Popular）獲一席。

註⑥ Enrique A. Buloyra, *Negotiations War in El Salvador, Journal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 Spring 1986, pp. 136-137.

貳、武裝衝突

一般而言，中美洲是美國的「後院」，加勒比海如同美國的「內湖」，美國對外輸出的一半要經過墨西哥灣及巴拿馬運河，尤其是在戰時，美國對北約的補給大部份要通過此一地區。所以雷根就職伊始，曾採取緊急措施，援救薩爾瓦多危機。雷根除了派遣軍事顧問、增加武器及裝備支援薩爾瓦多政府——並發表「白皮書」，揭發蘇聯、古巴等共黨國家以武器支援薩國左派游擊隊實行顛覆的陰謀，呼籲西方盟國應與美國採取一致對抗政策。然而西方國家，尤其是西歐和加拿大都反對美國對中美洲國家的危機採取軍事干預，而呼籲以政治方法來解決薩國的危機。而美國參、衆兩院，在一九八二年薩國國會議員選舉以後，亦迫使雷根總統採取措施，調查薩國人權情況，並打開中美洲談判之門，促使薩國政府與左派游擊隊談判。因而雷根總統一方面儘可能的增加對薩國的軍事援助，另一方面則試探以和平方式解決薩國的流血衝突。經由雷根總統特使史東(Richard Stone)之斡旋，薩國政府於一九八三年八月廿九日開始和左派游擊隊在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進行談判。可是左派游擊隊拒絕放下武器參加選舉，致使談判不久即告破裂。^①一九八四年初，杜哈特在競選總統期間，曾一再表示要進行廣泛的談判，所以他當選總統後，首先即欲實現其諾言以談判解決流血衝突。在薩國大主教達瑪斯(Mgr Riveva Y Damas)的安排下，終於促成杜哈特總統親自與左派游擊隊在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舉行談判。第一回合談判是在薩國北部的拉巴瑪(La Palmas)城舉行，第二回合談判則是同年十二月一日在雅哥瓜羅(Ayagualo)城舉行。經過兩個回合的談判，雙方雖達成耶誕節暫時停火協議，但杜哈特公開拒絕左派游擊隊要求的條件，其中包括停止接受美國的軍事援助、承認左派游擊隊的合法地位、改組政府重新選舉等，並譴責左派游擊隊只是要利用談判達成延長內戰的目的，顯然毫無結束內戰的誠意。^②

當一九八〇年時，薩國政府軍是以七千人對抗一萬二千人的左派游擊隊，很難壓制左派游擊隊的攻勢。隨著雷根政府的軍事援助，薩國軍隊從一九八二年的二萬人，擴增到一九八五年的三萬人。^③雖然薩國政府軍足以壓制左派游擊隊的攻勢，但左派游擊隊却採取化整爲零的策略，分散政府軍的力量，然後又潛入城市，製造恐怖，擾亂治安。^④例如，一九八五年三月八日左派

註① The New York Times, Sept. 30, 1983, p.4.

註②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 12, 1984, p.6; le Monde, Dec. 4, 1984, p.6.

註③ José Z. Garcia, El Salvador: Legitimizing the Government. Current History, Mar. 1985, p. 103. 一九八七年政府軍已有五萬人，是一九八〇年時期的五倍。

註④ le Monde, Jan. 1, 1986, pp. 1-4.

游擊隊暗殺地方官員羅度夫 (José Rodolfo)，同年六月十九日左派游擊隊在城市中襲擊，有十三人喪生，其中六人是美國的軍事顧問，同年六月廿一日，又刺殺四名美國海軍人員。而最嚴重的是同年九月十二日，左派游擊隊綁架了杜哈特總統的女兒 (Ines Gualupe Duarte)。⑭這些暴行都會引起全國震撼。經過討價還價之後，左派游擊隊雖釋放了杜哈特之女，但是杜哈特總統則接受了左派游擊隊的條件，包括釋放了已被捕的七十六名游擊隊員、廿二名政治犯、兩名共黨頭目和九十六名仍在醫院療傷的游擊隊員。⑮從而左派游擊隊的暴行，引起了薩國政府對之展開大規模的軍事行動。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薩國政府軍，經由美國在宏都拉斯的軍事基地之支援，展開號稱「鳳凰計劃」 (Phoenix Operation) 的軍事行動。⑯配合此項軍事行動的空軍，以七百磅重的炸彈，在首都以北三十公里的哥薩巴 (Guazapa) 地區，從事長達數目的轟炸。⑰同時，政府軍配合政治作戰，組織鄉村民衆，使民衆與左派游擊隊分離，陷左派游擊隊於孤立。⑱此後，左派游擊隊即失去了鄉村民衆的掩護，而左派游擊隊人員亦折損大半。

杜哈特總統爲獲得左派游擊隊釋放其女而進行的談判，曾招致極右派聯盟的譴責和軍中的不滿，都認爲杜哈特爲了拯救其女，而喪失了政府的威信，因爲總統對於那些被俘的政府軍官，並未採取同樣的行動。以致使杜哈特的立場變得更爲脆弱，在短期內已無法恢復談判。(一九八七年二月杜哈特政府與左派游擊隊已展開交換戰俘的談判) 而左派游擊隊的恐怖暴行，不僅引起政府軍大舉清剿，同時亦失去了羣衆的支持與國際間的同情。因此，左派游擊隊與民主革命聯盟之間亦引起爭端。

自一九七四年後，隨著社會衝突的激化，左派激進份子乃先後創立人民革命軍 (Ejército Revolucionario del pueblo-ERP)，人民解放軍 (Fuerzas populares de liberación-FPL)，人民抵抗軍 (Fuerzas Armadas de Resistencia Nacional-FARN)，勞工革命黨 (Partido Revolucionario de los Trabajadores Centroamericanos-PRTC)，以及武裝解放軍 (Fuerzas Armadas de liberación-FAL) 等五個武裝革命組織。一九八〇年三月廿八日，薩國大主教羅邁洛 (Mgr Oscar Armilo Romero) 被刺殺而引發社會暴亂之同時，五個武裝革命組織聯合組成「法拉蓬多·馬丁解放陣線」 (Frente Farabundo Marti de liberación Nacional-FMLN)。左派政黨亦組成一個「革命民主聯盟」 (Frente Democrático Revolucionario-FDR)，而形成一個政治革命組織。兩者聯合即成爲具有政治目標的武裝革命組織 (FMLN-FDR)。但是由

註⑭ Enrique A. Buloyra, *op. cit.*, pp. 132-133.

註⑮ *Latin America Weekly Report*, Nov. 1, 1985, p. 3.

註⑯ Michael Stuenkel, *ni paix ni guerre au salvador. Le Monde diplomatique*, Dec. 1986, p. 16.

註⑰ *Ibid.*

註⑱ *Ibid.*

安古(Guillermo Ungo)和魯賓(Ruben Zamora)所領導的「民主革命聯盟」，其最終目標是主張以政治方法解決流血衝突，與左派游擊隊要以武裝鬭爭獲致最後勝利，在方法上有所不同。特別是安古和魯賓原屬於中間派的「基督社會人民運動」(Movimiento Popular Social Cristiano-MPSC)和「國民革命運動」(Movimiento Nacional Revolucionario-MNR)，他們和杜哈特總統都是多年老友，一九七二年安古曾與杜哈特總統競選總統和副總統。他們都是爲了反對軍事獨裁，而在一九八〇年轉向左派的革命陣線。所以民主革命聯盟與左派游擊隊之間早已存有矛盾。

左派游擊隊一直在譴責政府的空中轟炸，造成軍民重大傷亡，認爲政府軍如果沒有美國支持，即無法作戰，故堅持美國從薩國撤退爲談判的先決條件。但是他們從雷根總統的強硬政策來看，又懷疑談判的效果，所以基本上他們不相信杜哈特總統的和平意願，而要以一個長期的人民戰爭，從經濟的破壞，城市的恐怖，來動搖杜哈特政府的基礎，消耗政府軍的力量。所以他們認爲從一九八五年以來，以恐怖主義從事長期的戰爭，已打擊了基民黨政府的威信，分化了軍方、中立主義者以及政府之間的關係，特別是綁架杜哈特總統的女兒是他們革命行動中的一大勝利。但是民主革命聯盟，對左派游擊隊的恐怖主義曾予公開的譴責，特別是對左派游擊隊綁架杜哈特之女的事件，曾公開表示遺憾，聲言此一事件與該聯盟無關，該聯盟不負任何責任，並且民主革命聯盟的頭目安古經常利用各種傳播媒體發表以談判來解決流血衝突的主張，期望從多元化的政治上，恢復以往和中間派的合作，形成一個改革的力量。^⑮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日，薩爾瓦多大地震，薩國情勢更爲惡化。杜哈特總統擔心左派游擊隊利用社會緊張情勢，故拒絕左派游擊隊要求停戰的建議。杜哈特總統堅持左派游擊隊應先放下武器，否則即只有使用武力來消除左派游擊隊。而薩國天主教達瑪斯(Mgr Riverai Y Damas)亦譴責左派游擊隊拖延戰爭的戰術。薩國天主教會一直擔任中間調停的角色，但是天主教會却不同意左派游擊隊的綁架、暗殺、破壞經濟設施等恐怖活動。左派游擊隊不願意與民主革命聯盟破裂，唯恐陷於孤立，又企圖發動一項能擴大羣衆力量的人民解放運動。一九八六年九月間，左派游擊隊五個領袖之一的岡薩地茲(Leonel Gonzalez)公開宣稱，表示左派游擊隊不可能獲得軍事上的勝利，因爲薩國政府軍有美國的軍事援助。但是他認爲，雖然左派游擊隊仍有戰鬪的力量，但是政府軍以政治作戰，已使左派游擊隊漸趨孤立。所以他表示左派游擊隊應改變策略，重視羣衆運動，在薩國經濟逐漸惡化以及杜哈特政府的諾言無法實現的情況下，羣衆必然會站在左派游擊隊的一邊，這些對左派游擊隊的目標一樣有利。^⑯接著同年十一月六日，左派游擊隊的電臺宣稱左派游擊隊要利用大地震和國內經濟危機，發動一項新的戰鬪，以保衛人民的財產、鼓勵人民參

註⑮ Enrique A. Buloyra, *op. cit.*, p. 131.

註⑯ Michael Stuenkel, *op. cit.*, p. 16.

加各項政策的決定、重建房屋、維護人民的自由權益。其最終目的，即是要吸收羣衆，擴大組織，聯合所有愛國、愛民主的團體和組織，擴大其革命力量，發動能獲致勝利的戰鬪。^⑮

叁、經濟危機

薩國經過七年的內戰，除了已有六萬人喪生外，經濟建設多遭破壞，造成薩國的經濟情況越來越爲惡化。據美國國務院一九八五年的估計，薩國內戰直接造成的損害已達八億美元。然而一般認爲此項估計太過保守，如果加上經濟發展與生產所受到的阻礙，其在經濟上的損害應是此一數字的四倍。

薩國盛產咖啡，僅次於巴西和哥倫比亞之後，曾爲世界第三大咖啡出口國。雖然自一九六〇年代起，薩國已努力從事甘蔗、棉花、畜牧等農產，但咖啡仍是主要農產品之一。一九六〇年中美洲共同市場成立以後，薩國會以咖啡出口收入支持其工業發展。雖然工業發展使城市漸趨繁榮，但農村落後的情況却依然沒有改變。一九六九年七月，宏、薩戰爭以後，中美洲共同市場陷於癱瘓，地區經濟合作停止，薩國的出口以及經濟發展幾乎完全依靠美國。且人口急劇增加，從一九七八年的四百三十萬人，增加到一九八四年的五百三十萬人，五年間增加了一百萬人。經濟成長趕不上人口增加的快速，亦是經濟發展困難的原因之一。

從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三年，薩國的國民生產減少了二五%，輸出減少了三三%。一九八四年的通貨膨脹率達四〇%，物價通常比政府規定的價格要貴六〇%。隨著出口的減少，再加上國家預算的一半用於軍費，財政亦漸趨惡化，一九八四年薩國的財政赤字已增加到十億美元。一九七八年薩國只有三億三千九百萬美元的外債，至一九八三年外債已增加到十億八千零五百萬美元。^⑯由於內戰的影響，迫使很多農民放棄了他們的土地，因而農業生產從一九八一年的六·四%，下降到一九八三年的三·二%。一九八四年的棉花生產只是一九七九年的一半。在工業部門，經過幾年的內戰，到一九八四年底，已有九十三家工廠關門，七〇%的資金外流，而嚴重的問題是外匯短缺，一般必需以黑市高價才能獲得外匯。政府在管制外匯方面，不得已只好採行官價（officially exchange Rate）與平行（Parallel exchange Rate）的兩種不同匯率，前者是以官定價格二元五角科侖（Colon）兌一美元，而後者則是以四元科侖兌一美元。^⑰一九八四年底，在進口方面，官定匯率只限於食物、石油、醫藥、肥料以及殺蟲

註⑮ Ibid.

註⑯ The Latin American Times, Feb. 17, 1986, p. 7.

註⑰ Ibid.

劑等必需品。而其他工業品、奢侈品進口，均要按照平行匯率結算。在輸出方面，只有四〇%的輸出可適用平行匯率，這包括棉花、蝦、工業製品，以及大約二〇%的咖啡、糖等出口所得，雙重匯率使薩國工商業受到很大傷害。

事實上，薩國不斷接受美國的財政援助，但是此項援助，不僅無法改善其經濟發展的條件，亦未能普及廣大貧苦大眾，因為薩國有十四個大家族，一直控制著全國大部份的財富。^②一九八六年十月十日，薩國發生大地震，造成十萬人傷亡之慘劇，廿萬人無家可歸，有廿億美元的財產損失，相等於自一九八〇年以來美國所給予的全部經濟援助。大地震亦製造了更多的窮人，使杜哈特總統的改革計劃完全停頓。因此，杜哈特要使廣大中產階級替代那些寡頭政治領導的希望完全破滅。換言之，大地震不僅助長薩國經濟更為惡化，亦使原已惡化的社會兩極——少數富有者和大多數的貧窮——持續擴大。

杜哈特總統經過幾年來不明確的經濟政策，在美國及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壓力之下，終於在一九八六年一月宣佈推行「經濟穩定計劃」(Plan de Estabilización Económica)。此一計劃包括科侖貶值、削減財政赤字、增加咖啡產銷稅以及非民生必需品的稅賦，並以一年為期，減少進口。杜哈特總統要從緊縮貨幣的發行及抑制物價來支持貨幣貶值。因為從一九八五年以來，薩國消費品物價指數已上升了二二%，一九八六年更高達三一%，政府必須採取嚴厲措施控制一些重要物品的價格，特別是石油、瓦斯、水泥、米、奶粉、食用油、醫藥、大豆、穀類等。另外繼續對咖啡、蔗糖價格加以控制，建立最低保證價格，以利匯率的統一。統一匯率是五元科侖兌一美元。在提高最低工資的同時，亦提高了公營事業的價格，從公車車資的二〇%至汽油的五〇%不等。

杜哈特總統的經濟穩定計劃，是其執政以來第一次全面調整經濟政策，他希望藉此來解決惡化的經濟問題。但是至一九八六年七月，薩國物價仍在繼續上升，而幣制貶值亦沒有制止通貨膨脹，外債已達二十億美元。^③咖啡出口仍然受到國際市場價格的限制，甚而咖啡出口比一九七九年仍然減少三〇%；一九七九年咖啡出口是十一億美元，一九八五年只有七億九千萬美元。特別嚴重的是失業人口繼續增加，加上內戰中離家失所的難民，一九八六年的失業人口已高達五〇%。總之，從一九七九年迄今，薩國農工業生產減少了一半，有四〇%的鄉村農民湧入都市。杜哈特總統的新經濟政策對那些農民和窮人的生活沒有甚麼改善。生活費用猛漲，但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仍只有四百五十科侖，如以統一匯率五科侖對一美元計算，約等九十美元。而無地耕種的農民平均每年只工作四個月，其收入無法維持最低的生活。因而杜哈特總統的新經濟政策，為了獲得資本家的支持，却失去了窮人的擁護，特別是杜哈特要維持與美國的友好關係，建立傾向美國的「自由工會」(AIFLD)，而引起一向支持杜哈特總統的勞工

註② Michael Stuhrenberg, *op. cit.*, p. 16.

註③ Enrique A. Buloyra, *op. cit.*, p. 139.

組織「民主人民聯盟」(Union Popular Democrática-UPD) 的反對。包括有一五〇個工會和四十萬工人的「勞工聯盟」(Unidad Nacional de los Trabajadores Salvadoreños-UNTS) 亦不再支持杜哈特政府，而恢復以往反對政府的立場，使基民黨的社會羣衆基礎崩潰。

因爲杜哈特總統的新經濟政策已招致國內各界激烈的反應；左派認爲杜哈特政府是向美國壓力投降，而右派則指控此一措施只有利於政府官員的貪污和腐化。左派和右派都反對杜哈特政府，以致工會又領導羣衆走向街頭。從一九八七年初，工人罷工與示威，曾造成工商業和交通的癱瘓。②而左派游擊隊和「民主革命聯盟」亦在同年一月二日簽訂聯合公約，企圖利用社會騷亂的情勢展開新的攻勢。③左派游擊隊一方面封鎖重要的公路，使蔗糖、咖啡、棉花的運輸陷於癱瘓，一方面向政府陸軍營區發動攻擊。同年三月卅一日及五月二日，左派游擊隊曾發動兩次攻擊，造成政府軍二百多人傷亡。面對國內反對浪潮，杜哈特總統指控左右兩派有意激起軍事政變。軍方已否認有軍事政變的企圖，然而右派仍在警告，如果杜哈特不能停止此項經濟措施，將會有嚴重的後果。

肆、國際環境的改善

在一九八四年三月薩國大選以前，由於左右兩派的流血鬭爭，人權的惡化，不僅美國國會對薩國的軍事援助因常以改善人權爲條件，而有所阻礙，在國際間有些國家曾表示同情薩國的左派游擊隊。所以薩國大選以後，杜哈特不只是一是要從內政上進行各項改革，亦要從國際關係方面建立薩國的新形象。事實上，薩國的內戰不只是來自內部各種問題的激化，並且亦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特別是左派游擊隊接受古巴和尼加拉瓜的支援，而薩國政府則依靠美國的援助。④因此，杜哈特總統爲繼續獲得美國的援助，曾兩度訪問美國，同時展開外交攻勢，爭取國際間的支持。顯然地，在過去幾年，杜哈特已成功的新重新打開國際關係，突破了國際間的孤立。

註② *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 Feb. 4, 1987, p. 1.

註③ *Le Monde*, Apr. 2, 1987, p. 1.

註④ 在軍事援助方面，美國從一九八〇至一九八六年，六年中已提供廿五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Le Monde*, Apr. 2, 1987, p. 1.)。

在經濟援助方面，美國對薩國的經濟援助在一九八〇年是五千八百五十萬美元；一九八一年是一億一千三百六十萬美元；一九八二年是一億八千二百二十萬美元；一九八三年是一億四千一百九十萬美元；一九八四年是三億二千五百七十萬美元；一九八五年是三億一千零七十萬美元。(*The Latin American Times*, Feb. 13, 1987, p. 28.)

所以薩國大選以後，國際間已有不少國家改變了以往的立場，不再同情薩國左派游擊隊，甚而重新提供薩國各項援助。一九八四年七月，西德停止對薩國左派游擊隊的同情，而給予薩國一千八百萬美元的貸款。一九八四年九月，在哥斯達黎加召開的中美洲國家和歐洲共同市場國家外長會議，歐市承諾提供薩國經濟援助。一九八五年十一月，杜哈特總統訪問法國和西班牙，兩國亦結束了對薩國左派游擊隊的同情，而開始對薩國提供援助。英國在中斷五年以後，亦恢復了對薩國的援助。於是杜哈特總統所領導的民主政府，已使國際間排斥薩國的行動宣告結束。

在西半球，墨西哥是支持薩國左派游擊隊，反對美國軍事干預，主張薩國政府與左派游擊隊談判最力的國家。然而薩國大選以後，一九八五年十月，墨西哥不僅停止了中立，而且恢復了與薩國的外交關係。一九八六年五月，杜哈特總統又因訪問「康塔多拉集團」四國（巴拿馬、哥倫比亞、委內瑞拉與墨西哥），而使薩國恢復了其在西半球的合法地位。此外，在中美洲地區，杜哈特總統爲了共同對付尼加拉瓜，改善了與宏都拉斯和哥斯達黎加的關係。自從一九八五年十一月瓜地馬拉大選，「基督教民主黨」領袖塞瑞柔（Vinicio Cerezo）當選總統以後，又給杜哈特總統一個新的機會；從兩位同屬基民黨的傳統友好關係來看，兩國將携同中美洲國家，共同促進中美洲的民主政治發展，加強地區的合作，以尋求地區的和平。一九八七年五月廿一日脫稿

（本文作者現為本中心研究員）

中共的政治與戰略

本書係日本東京大學教授中嶋嶺雄所著；趙倩、張隆義、楊怡芬等譯，曾永賢審稿。

本書旨在找出，自從中共政權明確的脫離毛澤東模式以來，迄今所歷經的各種軌跡，並對中共未來的發展取向作一預測性展望。全書十七萬字，計二九〇頁。實售精裝本新台幣二四〇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二元）。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印行